



大会

Distr.: General
25 October 202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七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 66(a)

消除种族主义、种族歧视、
仇外和相关不容忍言行

当代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和相关不容忍言行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处谨向大会转递当代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特别报告员滕达依·阿丘梅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43/36 号决议编写的报告。

* 本报告逾期提交，以反映近期动态。



当代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 特别报告员滕达依·阿丘梅的报告

生态危机、气候公正和种族公正

摘要

当代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特别报告员滕达依·阿丘梅在本报告中着重指出，环境退化(包括气候变化)在根源和后果上都存在种族歧视和不公正。她在本报告中说明了为什么如不采取具体行动解决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特别是殖民主义和奴隶制遗留的历史问题和当代种族问题，就不可能切实减轻或解决全球生态危机。

一. 导言

1. 全球生态危机同时也是一场种族公正危机。正如已收到的无数研究报告和材料所表明的那样，生态危机的破坏性影响不成比例地由那些因种族、族裔和民族归属而处于边缘地位的群体承担，这些群体由于其种族、族裔或民族归属而面临歧视、排斥和系统性不平等条件。在各国，这些群体绝大多数是受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最为严重地区的居民。¹ 这些群体不成比例地集中在全球“牺牲区”——由于环境退化而变得危险甚至无法居住的地区。牺牲区集中在全球南方的前殖民地，而全球北方却是造成这些状况的主要原因。正如与享有安全、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环境有关的人权义务问题特别报告员所指出的：“高收入国家继续不负责任地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输出危险材料……以及相关的健康和环境风险”。² 值得注意的是，“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之间的区别与殖民时代发生的种族主义经济榨取和剥削直接相关，但殖民大国没有为此承担责任。³

2. 本报告所述的“牺牲区”更准确地说是“种族牺牲区”。种族牺牲区包括土著人民的祖传土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领土、全球北方的种族隔离社区以及面临干旱和环境破坏的被占领土。这些种族牺牲区的主要受益者是跨国公司，它们将财富输送到全球北方以及全球各地享有特权的国家精英和地方精英。⁴

3. 除了记录种族牺牲区的情况之外，特别报告员还强调了在生态危机背景下被迫流离失所和无法流动的状况，以及在种族、族裔和民族方面处于边缘地位的群体如何分别受到这种强迫流离和无法流动的影响。所收到的材料表明，气候引起的迁移为何与基于种族的不公正等级制度和殖民和帝国时期的榨取和剥削制度不可分割，这些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谁被迫迁移，谁享有保留家园和国家的特权。

4. 在整个环境公正运动中，气候公正旨在要求对气候变化负有责任的国家和实体承担历史责任。气候公正还寻求从根本上改变那些导致全球生态危机并以种族歧视方式分配这场危机所带来痛苦的当代制度。今天的气候变化是由大气中的温室气体积累所引发的，历史上的排放是个依然存在的当代问题。1850 年至 2002 年间，工业化国家产生的二氧化碳是整个全球南方的三倍。⁵ 然而，全球南方和世界上被殖民者指定的非白人地区受到的影响最大，最没有能力缓解全球生态危机并生存下去，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最初在殖民过程中产生的以往排放。

¹ 由于篇幅有限，本报告重点关注与采掘主义和气候变化有关的环境人权损害。特别报告员强调，迫切需要对环境公正和种族公正的交叉点进行更广泛和更全面的分析。

² 见 [A/HRC/49/53](#)。

³ 见 [A/HRC/50/60](#)；[A/HRC/41/54](#)。

⁴ 见 [A/HRC/50/60](#)。另见，经济和社会权利中心提交的材料。

⁵ Sarah Mason-Case and Julia Dehm, “Redressing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unjust precarities of climate change in the present”, in *Debating Climate Law*, Benoit Mayer and Alexander Zahar, ed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5. 秘书长恰如其分地将巴基斯坦最近发生的洪水描述为“超乎想象的气候大屠杀”，并指出巴基斯坦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全球占不到 1%。美利坚合众国一个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总累计排放量的 20%。⁶ 1751 年至 2010 年，欧洲联盟占 17%，总部主要位于全球北方的 90 家跨国公司占累计工业排放量的 63%。⁷

6. 正如专家们指出的那样，全球北方在历史上的排放量并没有使所有人平等受益。相反，它们的生产依赖于并促成了对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定居者殖民地的种族主义殖民征服。不平等现象延续至今。根据一份资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两周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布基纳法索、埃塞俄比亚、几内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或乌干达一个居民一年的排放量。非洲与能源相关排放量约占全球排放量的 2%，却可能承担全球适应气候变化成本的大约近 50%。正如非洲开发银行行长所指出的，非洲不应乞求别人帮助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污染大国应该提供资金。⁸ 全球南方的其他地区也是如此。

7. 在联合国内外，会员国都在倡导制定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举措。在这种情况下，对这场危机采取种族公正的做法是紧迫而又必要的，但在全球框架内，这一做法仍然被完全边缘化。尽管全球环境公正倡导者作出重要努力，但特别报告员发现，在全球气候治理制度中拥有权威、控制力、影响力和决策权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种族平等和不歧视准则，而这些准则是国际人权和更广泛的国际秩序的基础。坦率地说，在联合国协调全球生态危机应对措施的框架内，非白人的利益和关切尤其被成功地搁置在一边。全球应对环境危机的主要应对措施以具有同样的系统性种族主义特征，而系统性种族主义正是最初造成这些危机的驱动因素。环境、气候和种族不公正成为已制度化的现状。

8. “技术沙文主义”(即认为技术可以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信念)以及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过度依赖市场解决方案的做法正在加剧种族不公正。其原因部分是，技术官僚和技术领域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仍然以各种形式的系统性种族主义为特征，这些形式甚至在善意的“绿色”倡议中再现。⁹ 由于篇幅所限，特别报告员请读者参阅她以前对系统性种族主义、技术和全球政治经济的分析。¹⁰ 技术在解决生态危机方面可发挥关键作用，但技术解决办法的实施既不应以牺牲已受到生态危机严重影响、因种族和族裔而被边缘化的群体为代价，也不应为了追求“虚假解决办法”而加以推进。¹¹

⁶ 同上。

⁷ 同上。

⁸ Cara Anna, “Africa shouldn’t need to beg for climate aid, says bank president”, PBS News Hour, 11 February 2020.

⁹ Dehm、Sealey-Huggings 和 Gonzalez 提交的材料。

¹⁰ 见 [A/HRC/44/57](#)、[A/HRC/50/60](#) 和 [A/HRC/41/54](#)。

¹¹ Desmond D’sa (South Durban Community Environmental Alliance)和 Patrick Bond (University of Johannesburg)提交的材料。

9. 特别报告员承认，在环境人权分析中普遍提到脆弱性或“弱势群体”。她强调指出，明确和直接地应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种族不公正在规范和务实意义上都具有紧迫性。特别报告员警告说，在全球治理和政治经济中，包括在人权分析和应对措施方面，“不分肤色”的做法占主导地位。对法律、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进行不分肤色的分析，是为了表明致力于公平处事，即使某些个人和群体因种族压迫等历史原因而处于不同的地位，也要避免明确的种族分析，而要对所有个人和群体一视同仁。¹² 即使无视肤色的做法是出于善意，其最终结果也是无法挑战和推翻长期存在而又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架构。特别报告员强调，为了解决生态危机对不同种族和族裔的影响，联合国会员国、官员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必须明确说明这些影响。

10. 大会和人权理事会承认享有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环境的人权，¹³ 理事会在若干决议中指出了气候变化对人权的影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和理事会各特别程序提供了重要的人权知识，本报告就是在此基础上编写的。¹⁴ 这些特别程序重点指出了对平等和不歧视的关切，特别是在与性别、¹⁵ 年龄、¹⁶ 残疾、¹⁷ 性取向和性别认同、¹⁸ 土著人民¹⁹ 和非洲人后裔²⁰ 有关的方面。

11. 特别报告员受益于：专家组会议提供的宝贵意见和根据有针对性的呼吁提交的补充材料；与各联合国机构代表的访谈；一系列利益攸关方根据公开呼吁提交的材料。她感谢所有利益攸关方提交的材料。非机密性材料将来可在特别报告员网站上查阅。特别报告员强调，直接受影响社区的专门知识对她编写报告弥足珍贵。

二. 为什么当前的气候和环境危机需要种族平等和种族公正视角

A. 生态危机的种族主义和殖民基础

12. 对于处于气候和环境危机核心的全球系统和进程而言，系统性种族主义曾经是一项基本组织原则。若要理解和解决当代气候和环境不公正以及种族歧视问题，

¹² 见 [A/HRC/41/54](#)，第 14 段。

¹³ 见大会第 76/300 号决议和人权理事会第 48/13 号决议。

¹⁴ 见 www.ohchr.org/en/climate-change/reports-human-rights-and-climate-change。另见 [A/74/161](#)、[A/HRC/31/52](#)、[A/HRC/49/53](#)、[A/HRC/41/39](#)、[A/71/281](#)、[A/66/285](#)、[A/75/207](#)、[A/67/299](#)、[A/HRC/44/44](#)、[A/76/222](#)、[A/HRC/48/56](#)、[A/HRC/40/53](#)、[A/74/164](#)、[A/70/287](#) 和 [A/HRC/47/43](#)。

¹⁵ 见 [A/77/136](#)。

¹⁶ 见 [A/HRC/37/58](#)；[A/HRC/42/43](#)。

¹⁷ 见 [A/71/314](#)。

¹⁸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特别程序，“被迫流离失所的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在寻找安全避难所方面面临重大挑战”，人权专家在“国际不再恐惧同性恋、跨性别与双性恋日”发表的联合声明，2022 年 5 月。

¹⁹ 见 [A/77/238](#)。

²⁰ 见 [A/HRC/48/78](#)。

就必须用历史化方法考察“种族”和种族主义如何形成了气候和环境现实中的政治经济学，以及这些框架所代表的主要法律框架和世界观。气候危机的核心是温室气体排放水平，而这些排放是几个世纪以来自然资源开采、工业化和工业流程以及这些流程产出的消费所造成的。²¹ 一些专家在提交的材料中总结了大量的研究，描绘了各种种族主义殖民制度，这些制度曾经支撑煤炭、天然气和石油开采，并建立了一个依靠种族等级制度维系的全球资本主义制度，因此这些制度是全球生态危机的核心。²² 特别报告员在 2019 年题为“全球采掘主义与种族平等”的报告中还概述了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采掘主义和工业化进程所依赖的种族主义殖民基础。²³

B. 跨国环境种族主义和气候不公的当代表现

13. 国际社会对殖民主义的正式否定绝没有根除殖民统治及其种族主义遗留问题，包括与当代全球生态危机有关的问题。人权和环境问题特别报告员强调指出，虽然所有人都面临生态危机，但这一危机的负担不成比例地落在遭到系统性边缘化的群体身上，许多环境不公正现象的根源是“种族主义、歧视、殖民主义、父权制、有罪不罚以及系统性地忽视人权的政治制度”。²⁴

14. 在前殖民领土上，在种族上被认定为非白人的民众不成比例地承受着矿物燃料的开采、加工和燃烧所带来的环境负担。²⁵ 特别报告员在其 2019 年题为“全球采掘主义与种族平等”的报告中解释说，当代全球采掘主义经济之所以按种族划分阶层，是因为它起源于殖民时期，而且会员国——特别是那些从殖民统治中获益最多的国家——依然未能完成国际体系的非殖民化，也未能为起源于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种族歧视提供赔偿。²⁶

15. 遭受最贪婪采掘的领土是那些属于被殖民者指定为劣等种族的群体和民族的领土。正是殖民统治的历史以及后殖民时代的外来新自由主义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使那些最没有能力缓解和应对生态危机的国家变得如此。²⁷ 在全球北方，因种族和族裔而被边缘化的群体同样处于危机的前沿。

16. 非洲人后裔问题工作组详细阐述了环境种族主义和气候危机如何对非洲人后裔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其部分原因是殖民统治的种族歧视历史、贩卖非洲奴隶以及对非洲人后裔的系统歧视和隔离。²⁸ 土著人民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也对环

²¹ Gonzalez 提交的材料。

²² 例如，Dehm、Gonzalez 和 Sealey Huggins 提交的材料，包括 Greenpeace, *Confronting Injustice: Racism and the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2022)。

²³ 见 [A/HRC/41/54](#)。

²⁴ 见 [A/HRC/49/53](#)。

²⁵ Gonzalez 提交的材料。

²⁶ 见 [A/HRC/41/54](#)；[A/74/321](#)。

²⁷ 见 [A/HRC/50/60](#)。

²⁸ 见 [A/HRC/48/78](#)。

境种族主义和气候不公正问题作了类似阐述，因为这些问题影响到土著人民的生活，攸关他们的生存。²⁹ 一些提交的材料重点说明了生态危机及其驱动因素对不同种族造成的持续影响，其中一些材料强调了殖民时期遗留问题。³⁰

17. 强调殖民时期遗留问题的显著作用，不应意味着掩盖大国在排放当代温室气体和加剧环境退化方面在全球南方所起的作用。巴西、中国和印度是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全球南方的跨国和跨界活动本身就带来一系列的地缘政治和环境挑战。例如，中国在非洲的“一带一路”倡议就包含了与非洲债务陷阱和环境退化有关的大型工业项目，³¹ 在一些地方还造成无法弥补的生态破坏。³²

种族、族裔、民族归属和“牺牲区”

18. “牺牲区”一词源自冷战期间的一个说法，用于描述因核武器生产而受到辐射的地区。³³ 因种族而处于边缘地位的民众和前殖民地人民的社区不成比例地被核扩散的需要所“牺牲”，核试验对马绍尔群岛人民以及生活在军事超级大国控制领土上的土著人民和少数民族的影响就突出地说明了这一点。³⁴

19. 人权和环境问题特别报告员认为，“今天，可以把牺牲区理解为居民因生活在污染热点和严重污染地区而身心健康遭受破坏性后果和人权遭到侵犯的地方”。³⁵ 气候变化正在导致牺牲区大量增加，³⁶ 而这些牺牲区在许多地方实际上就是种族牺牲区。

20. 在亚马逊河和南美洲其他地方，土著环境人权维护者经常因抗议破坏其家园的工业项目而成为迫害对象。在一些情况下，环境保护者因其倡导行动而遭到威

²⁹ 见 [A/HRC/36/46](#)；[A/HRC/4/32](#)。

³⁰ 以下方面提交的材料：Maat for Peace, Development and Human Rights; Heinrich Böll Foundation; European Network Against Racism; Black Coalition for Rights; Global Justice Clinic; Sabantho Aderi (Lokono-Arawak); Gonzalez。

³¹ 人权高专办，大型基础设施投资对人权的影响和影响的基线研究，2017 年。

³² Gong Sen, Melissa Leach and Jing Gu,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SDGs: towards equitabl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DS Bulletin*, vol. 50, No. 4 (December 2019).

³³ Steve Lerner, *Sacrifice Zones: The Front Lines of Toxic Chemical Expos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2010), p. 2.

³⁴ Jessica Barkas Threet, “Testing the bomb: disparate impacts on Indigenous Peoples in the American West, the Marshall Islands, and in Kazakhstan”, *University of Baltimor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 vol. 13, No. 1 (2005).

³⁵ 见 [A/HRC/49/53](#)。

³⁶ 同上。

胁或谋杀。³⁷ 与此同时，根据一份材料，例如，巴西的大型开发项目所造成的环境破坏对基隆布人和土著社区构成长期威胁。³⁸

21. 在南亚，土著人民和那些受到种姓歧视的人们面临着开发项目对环境的破坏，而他们对这些项目只有有限的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在印度尼西亚，殖民时代的种族主义城市规划带来的遗留问题，再加上过度抽取地下水和扶持资本的适应对策，使雅加达甘榜的低收入居民遭受洪水和被迫流离失所的威胁。³⁹ 在整个东南亚，大肆进行的工业活动将环境退化和有毒废物的危害从全球北方的工业热点转移到了全球南方的非白人社区。⁴⁰

22. 一些材料强调了美国种族牺牲区的普遍存在。⁴¹ 例如，“癌症巷”是密西西比河沿岸的一条石化走廊，有 150 个石化设施在那里运营。由于非洲裔美国人占绝对多数，这里是美国多种癌症发病率最高的地区。种族主义带来的遗留问题笼罩着癌症巷。这里最初被称为种植园区，是一个被奴役的非洲人被迫劳动的地方。像“阳光工程”这样的新设施至少覆盖了四个祖先墓地并集中在第五区，该区 86.3% 的居民是非洲裔美国人。该地区的土地使用计划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已从“住宅类”改为“住宅/未来工业类”，从而使最大的塑料设施之一获得批准。相比之下，化学公司被禁止在第三区建造新的设施，因为该区 78.4% 的居民是白人。⁴²

23. 1987 年的一项研究揭示了一种全国性模式：美国因种族而被边缘化的社区居住在有毒废物附近的可能性是白人社区的五倍。⁴³ 正如一份材料所指出的，不能仅仅以收入不平等来解释这些差距：2008 年的一项深入研究发现，在美国，家庭年收入在 5 万至 6 万美元的黑人所居住的社区比家庭年收入在 1 万美元以下的一般白人所居住的社区污染更为严重。⁴⁴

³⁷ 人权高专办，“哥伦比亚：挑战企业活动的维权人士面临的极端风险”，2022 年 8 月 4 日；[A/HRC/46/35](#)；美洲人权委员会，“美洲人权委员会和联合国人权谴责在巴西谋杀环境活动家和基隆布人”，2022 年 1 月 24 日。

³⁸ 巴西黑人争取权利联盟提交的材料。

³⁹ Michelle Kooy and Karen Bakker, “Splintered networks: the colonial and contemporary waters of Jakarta”, *Geoforum*, vol. 39, No. 6 (November 2008); Jeroen Frank Warner and Hanne Wiegel, “Displacement induced by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the case of ‘climate buffer’ infrastructure”, *Sustainability*, vol. 13, No. 16 (August 2021); and Kian Goh, “Urban waterscapes: the hydro-politics of flooding in a sinking c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 43, No. 2 (March 2019).

⁴⁰ Benedetta Cotta,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Access and allocation problems in Global North-South waste trad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Politics, Law and Economics*, vol. 20 (2020).

⁴¹ Shirley 女士和 Heinrich Böll Foundation 提交的材料。

⁴² Human Rights Advocacy Project 提交的材料；JAL USA 33/2020 号来文。

⁴³ United Church of Christ, “Toxic wastes and r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 national report on the racial and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ties with hazardous waste sites”, 1987.

⁴⁴ Liam Downey and Brian Hawkins, “Race, income, and environmental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vol. 51, No. 4 (December 2008).

24. 一份材料表示,在加拿大,Aamjiwnaang 第一民族被安大略省人称“化学谷”的萨尼亚包围。居民面临较低的空气质量和大量的负面健康后果(例如流产、儿童哮喘和癌症)。⁴⁵

25. 在整个欧洲,罗姆人社区被迫生活在危险废物场附近或易受气候变化相关灾害影响的地区,这往往是为了给工业开发或旅游业让路。与此同时,爱尔兰流浪者群体往往无法获得具有文化特色的住宿,无法获得可靠用水、可负担取暖和供电。⁴⁶ 在北极地区,由于气候规律的变化,因纽特人、萨米人等土著人民面临的问题是海平面上升以及他们的生计被彻底摧毁。⁴⁷

26. 一份材料指出,⁴⁸ 欧洲关于环境公正的研究几乎完全侧重于收入不平等问题。种族和族裔因素基本没有触及,也没有收集根据这些因素分列的数据。这份材料提供实例说明,尽管长期以来有证据表明存在针对罗姆人和辛提人的环境种族主义,德国在这方面存在种种不作为问题。提交的材料还指出,德国的一些研究表明,污染性行业更经常地位于移民比例更高的城市和社区。这些国家和欧洲的研究表明,移民背景或非德国公民身份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相关性要比社会经济地位或收入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相关性更高。

27. 一份材料表示,在联合王国,因种族和族裔而被边缘化的群体比英国白人遭受的空气污染程度更高,也更容易受到污染造成的健康影响。此外,废物焚化炉的位置对给因种族和族裔而被边缘化的群体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⁴⁹

28. 一份材料⁵⁰ 表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军事占领如何导致了巴勒斯坦领土的生态遭到破坏和改变,并继续剥夺巴勒斯坦人的基本自决权,包括剥夺巴勒斯坦人采取土著办法减轻气候影响的权利。以色列定居者向巴勒斯坦领土的扩张导致数百个巴勒斯坦村庄被毁。⁵¹ 除了这种破坏外,原生树木也被欧洲松树所取代。提交的材料表示,为鼓励高污染工业迁往被占巴勒斯坦领土而提供了税收优惠措施,这对巴勒斯坦居民造成了巨大、有记录的遗传毒性影响。此外,该份材料表示,环境考虑因素被当作借口,用来为以色列人在被占领土上的进一步定居提供辩解。

29. 空气和水的广泛污染也造成巴勒斯坦人中严重疾病的发病率较高。据称,占领当局利用环境保护政策为使用土地辩护。提交的材料表示,以色列一直在利用保护自然保护区的说法没收更多土地,用于建造更多定居点,其做法被称为“洗

⁴⁵ Maat for Peace, Development and Human Rights 提交的材料; [A/HRC/49/53](#)。

⁴⁶ European Network against Racism 提交的材料。

⁴⁷ 同上。

⁴⁸ Heinrich Böll Foundation 提交的材料。

⁴⁹ Sealey Huggins 提交的材料(*Greenpeace, Confronting Injustice: Racism and the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⁵⁰ Al-Haq 提交的材料。

⁵¹ JAL ISR 2/2022 号来文。

绿”。此外，该材料还表示，西岸总用水量的 91% 被征用，仅供以色列定居者使用，而巴勒斯坦人却面临严重的用水无保障。⁵² 人权高专办表示：“以色列当局根据两套不同的法律对待居住在西岸(不包括东耶路撒冷)的近 45 万以色列定居者和 270 万巴勒斯坦人，从而在包括获得用水在内一系列问题上导致不平等待遇”。⁵³ 事实上，以色列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做法和政策形同种族隔离，对巴勒斯坦人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环境和人权后果。⁵⁴

30. 一份材料指出，军事化占领和新殖民主义采掘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也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气候脆弱性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干预、新自由主义胁迫以及拉丁美洲与军事超级大国(特别是美国)之间不平等关系是一部血腥历史，使该地区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导致的缓发灾难的影响。⁵⁵ 在加勒比地区，自耕农和农民面临灾难性的气候变化，这使农业劳动日益困难，主要影响到贫穷自耕农和农村妇女。⁵⁶ 在中美洲，气候变化导致暴力和与气候相关的迁移，这种迁移往往途径北美洲危险的气候通道，以种族化排斥为其特征。⁵⁷

31. 在中东，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入侵和军事干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该区域矿物燃料储量丰富。全球北方的国家和跨国公司与威权主义精英合作开采该区域的化石燃料，这加剧了气候变化，并使得对侵犯当地社区和因种族被边缘化的移民劳工的人权行为长期化。⁵⁸

32. 在整个非洲大陆，正当非洲国家由于生态系统干旱而在气候变化中勉力维持当地民众的生计之时，⁵⁹ 采掘项目和有毒废物倾倒对自然环境造成严重破坏。⁶⁰ 一份材料报告了非洲牺牲区的普遍存在，赞比亚的卡布韦就是其中一例——该地区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其部分原因是被废弃的采矿残留物。据估计，生活在那里的儿童中，超过 95% 的人血液中的铅含量很高。⁶¹ 另一份材料重点介

⁵² Al-Haq 提交的材料。

⁵³ 见 [A/HRC/48/43](#)。

⁵⁴ 见 [A/HRC/49/87](#)。

⁵⁵ Gonzalez 提交的材料。

⁵⁶ Haitian Civil Society Consultation 和 Sealey-Huggins 提交的材料。

⁵⁷ Sabantho Aderi (Lokono-Arawak) 和 Global Justice Clinic 提交的材料。

⁵⁸ Gonzalez 提交的材料。

⁵⁹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Climate Change 2022: 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 Working Group II Contribution to the Six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⁶⁰ Amnesty International, “Trafigura: a toxic journey”, 2016.

⁶¹ Maat for Peace, Development and Human Rights 提交的材料。

绍了各社区几十年来由于来自近海石油和天然气钻探以及南非德班不断泄漏的石油管道所造成的污染而与跨国公司进行的抗争。⁶²

33. 因为海平面上升、自然灾害加剧和自然生态破坏威胁着生命和生计，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各种极端风险。⁶³ 多维脆弱性指数是一个新制定的衡量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经济、地理、金融和环境脆弱性的指标，根据这个指标，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得分比全球平均数高 50-60%，这表明其脆弱性比收入水平所表明的脆弱性更为严峻。⁶⁴ 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生态危机预计将在 21 世纪结束之前使其部分领土不复存在。⁶⁵

种族、族裔、民族归属和气候引起的流离失所

34. 正如特别报告员在以往报告中所详述，种族歧视和仇外性质的歧视是强迫流离失所的根源，但它们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谁可以在边界内和跨边界流动，谁被迫不能行动。⁶⁶ 在环境和气候引起的流离失所方面，情况确实如此。⁶⁷ 环境种族主义和气候不公正的表现形式包括被迫流离失所，以及因种族而被边缘化的群体无法逃离污染热点或自然灾害风险升级的地区。

35. 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称，90%的难民和大多数境内流离失所者来自高度气候脆弱性国家。⁶⁸ 与此同时，高度气候脆弱性国家接收了 40% 以上的难民，而在受冲突影响和气候脆弱的国家中，境内流离失所者往往流落到他们面临气候相关灾害并易受气候相关灾害影响的地区。⁶⁹ 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面临双重风险：一方面，定居点过度集中在气候变暖程度高于平均水平以及面临极端温度、干旱等特定气候危害的区域；另一方面，这些人群经常居住在临时性却又世代延续的定居点和法律环境中，同时在他们为躲避气候影响而迁往他处的能力方面面临法律和经济障碍。这些定居点大部分集中在萨赫勒、⁷⁰ 近东和中

⁶² D'sa、Bond 提交的材料。

⁶³ Michelle Mycoo and others, "Small islands", in *Climate Change 2022*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⁶⁴ 开发署，“努力建立多层次脆弱性指数”，讨论文件，2021 年 2 月。

⁶⁵ 同上。

⁶⁶ 见 [A/HRC/38/52](#)；[A/HRC/48/76](#)；[A/75/590](#)；[A/HRC/44/57](#)；[A/HRC/35/41](#)。

⁶⁷ Carmen Gonzalez, "Climate change, race, and migration", *Journal of Law and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9 (2020).

⁶⁸ 联合国新闻，《气候变化与最弱势群体流离失所的联系清晰明了：难民署》，2021 年 4 月 22 日。

⁶⁹ Based on analysis of available data from Intern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Centre, Global Internal Displacement database, available at www.internal-displacement.org/database/displacement-data; and the Notre Dame Global Adaptation Initiative, Country Index database, available at <https://gain.nd.edu/our-work/country-index/>.

⁷⁰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萨赫勒冲突十年使 250 万人流离失所”，2022 年 1 月 14 日。

亚，⁷¹ 那里的气温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极端气温将超过安全居住的阈值。许多难民是因种族和族裔而处于边缘地位的人。国际边界制度中的系统性种族主义限制了因种族而处于边缘地位的民众的流动，同时又允许全球北方的公民在旅行、迁移⁷² 和躲避环境不安全地区方面享有空前自主权。由于气候变化被视为一个安全问题，安保公司和其他行为体正在助长边境军事化，这进一步阻止了许多因气候条件而流离失所的人找到安全地方。⁷³ 在国家内部，空间隔离和住房或经济机会方面的歧视使得因种族而被边缘化的社区卡在国内特定地点。⁷⁴

36. 一些材料强调了从种族牺牲区被迫流离失所的情况以及那些能够并选择离开的移民和难民所遭受的种族主义和仇外待遇。一份材料称，⁷⁵ 气候变化对农民生计造成负面经济影响，从而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流离失所，并向城市地区和海地以外地区迁移。种族主义限制了海地人的迁徙自由，限制了他们通过有尊严的迁移逃避气候危害的能力。在美国，根据《美国法典》第 42 章，海地人是被驱逐出境的对象，该法被用来在边境拘留和排斥海地移民。⁷⁶

37. 根据一份材料，⁷⁷ 在莫桑比克，大型国际采矿项目的扩张愈演愈烈，这些项目是造成境内流离失所的社会环境冲突的主要根源。来自 Mithethe、Chipanga、Bagamoyo、Malabue 等社区的 1 365 个家庭因巴西跨国公司“Vale”在太特省莫阿蒂泽运营的煤炭勘探项目而流离失所。多国公司在对待该地区流离失所者的做法上与殖民时期的暴力做法如出一辙。实施该项目的决定是强加于受影响社区的，这些社区被排除在决策之外并受到警察恐吓。受跨国公司伤害的大多数民众是农民、低收入的土著人民和因种族而被边缘化的群体。当地人时时生活在恐惧中，担心因为说了反对公司的话而遭到报复。

38. 另一份材料⁷⁸ 着重介绍了美国农业部门的长期种族主义历史，其中包括将美洲土著人强行赶出家园、奴役非洲人及其后裔以及在不人道条件下剥削拉丁裔农场工人。联邦和州一级的政策在历史上一直有利于白人男性，一些州阻止非白人个人获得赔偿或土地所有权。白人拥有 98% 的农田，而 80% 的劳动力却是拉丁裔。各种宅地法不成比例地将获得补贴的农场给予白人个人和公司，而联邦政府在贷款给非白人自耕农方面存在歧视。大萧条期间，南方地主试图将黑人佃农排除在新政立法之外，这引发了一种被称为“农业例外论”的持久现象，即系统性地排除农场工人在《国家劳工关系法》、《公平劳动标准法案》等联邦劳工保护之外。根据这份材料，气候变化正在迫使更多的人迁移，并使在美国寻找工作的人数增

⁷¹ 难民署，“气候紧急情况前线的流离失所者”，2021 年。

⁷² E. Tendayi Achiume, “Racial borders”, *The Georgetown Law Journal*, vol. 110, No. 3 (2022).

⁷³ Francis 提交的材料。

⁷⁴ 见 [A/HRC/49/48](#)。

⁷⁵ 全球司法诊所提交的材料。

⁷⁶ JAL USA 27/2021 号来文。

⁷⁷ Eusébio 提交的材料。

⁷⁸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和美国的世界面包组织提交的材料。

多。然而，超过一半的农场工人没有移民身份，那些合法入境的人也很容易受到虐待。工人通常面临低工资和不安全的工作条件。

39. 有一份材料⁷⁹ 表示，在中美洲和墨西哥，土著和黑人社区由于受到不同程度的采掘主义影响和普遍的社会经济边缘化而被迫流离失所。据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组织)称，中美洲面临发生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水文气象事件的巨大风险。在该区域七个国家的六个国家中——即古巴、萨尔瓦多、海地、洪都拉斯、墨西哥和尼加拉瓜，发生人道危机和灾害的风险程度处于中等和高度。⁸⁰ 尚未制定有效政策来保护流离失所者，而在流离失所者试图迁移时，他们的人权因基于种族和族裔的刑罪化而进一步受到损害。土著移民、不讲西班牙语的移民和黑人移民在获得就业、教育、医疗保健和住房服务方面面临制度化歧视的障碍。

40. 向特别报告员提交的许多材料指出，由于海平面上升和自然灾害，土著人民面临着被迫离开其祖传和传统家园的前景。一份材料表示，在印度，土著人民只占总人口的 8%，却占流离失所者的 40-50%。⁸¹ 工业项目在其属地上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是一个主要原因。所有土著属地，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土著属地都处于危险之中，即使整个国家的人口全面迁移，也无法改变其岛屿被毁的后果。⁸² 如不采取紧急纠正行动，土著家园的永久丧失现在是、将来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全球性失败和在种族意义上的严重不公。

三. 基于种族歧视的侵犯环境人权行为

A. 适用的法律框架

41. 不歧视和禁止种族歧视是国际公法的强行法。⁸³ 不歧视和平等义务也广泛载于各项国际人权条约，包括《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和《残疾人权利公约》。⁸⁴

⁷⁹ 墨西哥和中美洲种族主义观察站提交的材料。

⁸⁰ Lilian Yamamota and others, *La Movilidad Humana Derivada de Desastres y el Cambio Climático en Centroamérica* (Genev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2021).

⁸¹ Gupta 提交的材料。

⁸² Vano 提交的材料。

⁸³ 见 [A/77/10](#) 和 [A/CN.4/727](#)。另见巴塞罗那电车、电灯及电力有限公司案，判决书，《1970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3 页；南非不顾安全理事会第 276(1970)号决议继续留驻纳米比亚(西南非洲)对各国法律后果，咨询意见，《国际法院判例汇编》(1971 年)，第 16 页。区域人权机制重申不歧视和平等原则的地位和义务，认为这是享有人权的基础。例如见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第 245/2002 号来文，第 169 段；美洲人权法院，2003 年 9 月 OC-18/03 号咨询意见，第 101 段。

⁸⁴ 见《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儿童权利公约》，第二条；《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一条；《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一条；《残疾人权利公约》，第二条；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就业和职业歧视的第 111 号公约(1958 年)，第 1(a)款。

42.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载有最全面的禁止种族歧视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将种族歧视界定为“基于种族、肤色、世系或民族或人种的任何区别、排斥、限制或优惠，其目的或效果为取消或损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或公共生活任何其他方面人权和基本自由在平等地位上的承认、享有或行使”。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在其一般性建议中明确指出，不能对禁止种族歧视作出限制性解释。⁸⁵ 委员会还指出，《公约》适用于有目的或有意的歧视，以及实际上的歧视和结构性歧视。在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这种实质性而非形式上的平等做法尤其重要，因为在这些情况下很难证明歧视性意图，但环境损害的不同影响却显而易见。

43.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五条要求缔约国消除在享有经济、社会、文化、公民及政治权利方面的种族歧视。第二条要求缔约国除其他外，“采取有效措施，审查政府、国家和地方的政策，并修正、撤销或废止任何足以造成或维持在任何地方存在的种族歧视的法律和规章”，并“以一切适当方法，包括依情况需要制定法律，禁止并终止任何人、任何团体或任何组织所施行的种族歧视”。

44. 根据国际人权法，国家如属下述情况即违反了其义务：未能通过或执行旨在规范公共和私人行为体行为的反歧视立法；未能修正、撤销或废止任何具有造成或固化歧视效果的法律和条例；⁸⁶ 或未能立即采取一切适当和有效的措施，防止、减少和消除造成或固化一切形式歧视的条件、态度和偏见，或在必要时未能执行旨在实现事实上的实质性平等的具体特别措施。⁸⁷ 特别措施或“平权行动”——一国为实现实际平等、纠正不平等和歧视、和(或)确保处境不利群体或个人的进步而采取的具体步骤⁸⁸ ——是一种受保护的人权补救办法，⁸⁹ 国家必须在必要时予以执行。⁹⁰

⁸⁵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第 32 号一般性建议(2009 年)。

⁸⁶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第 20 号一般性意见(2009 年)，第 11、37 和 39-40 段；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1 号一般性意见(2004 年)，第 8 段。

⁸⁷ CCPR/C/21/Rev.1/Add.1，第 10 段；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第 16 号一般性意见(2005 年)，第 15 段；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第 20 号一般性意见(2009 年)，第 8(b)、9 和 39 段；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 25 号一般性建议(2004 年)。另见《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七条；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第 32 号一般性建议(2009 年)；CRPD/C/DOM/CO/1 号文件第 50 段。

⁸⁸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四条第一款；《残疾人权利公约》，第五条第四款；《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二条第二款；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第 6 号一般性意见(2018 年)，第 29 段；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18 号一般性意见(1989 年)，第 10 段。

⁸⁹ 见人权条约机构通过的一般性意见和一般性建议汇编，载于 [HRI/GEN/1/Rev.9 \(Vol. I\)](#)，特别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第 16 号一般性意见(2005 年)，第 9 和 39 段；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4 号一般性意见(2003 年)，第 1 和 12 段。

⁹⁰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二条第二款；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第 32 号一般性建议(2009 年)，第 30 段；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第 20 号一般性意见(2009 年)，第 8(b) 和 9 段；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28 号一般性意见(2000 年)，第 3 段。

45. “环境种族主义”一词描述的是制度性歧视，涉及“基于种族或肤色，有差别地对个人、群体或社区造成影响或不利(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环境政策、做法或指令”。⁹¹ 正如非洲人后裔问题专家工作组所指出的，环境种族主义在国家内部和跨国界发生。⁹² 非洲人和亚洲人后裔、土著人民、罗姆人、难民、移民、无国籍人和其他在种族和族裔上处于边缘地位的群体都受到环境种族主义的影响，因此必须根据国际人权法尽可能充分地解决这一问题。

46. 《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仍然是国际社会消除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最全面计划，提出了处理环境种族主义的建议。例如，它呼吁增加对非洲人后裔的支持，投资于“环境控制措施”，并提出了若干建议，要求“采取非歧视性措施，为遭受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和相关不容忍言行之害的个人和群体提供安全和健康的环境”。⁹³

47. 环境种族主义和气候不公正与其他形式的社会排斥(例如基于性别、年龄和残疾的歧视)相互作用。对与环境和气候有关的侵犯人权行为进行交叉分析时应认识到，属于种族边缘化群体的妇女、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性别和性取向不同的人面临着不同的侵犯人权行为。在一些提交的材料中明确提出了这一点。妇女尤其在农村和农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她们在环境和气候相关侵犯人权行为面前通常首当其冲。事实上，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及其原因和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报告说，气候变化引起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是一种独特的现象，其原因是相互交叉的脆弱性是女性特有的。⁹⁴ 老年人和儿童也容易受到气候危害，特别是当他们生活在经济边缘化社区或经济资源有限的国家，因而他们的具体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残疾人同样需要资源来适应和减轻气候变化造成的伤害，而由于系统性歧视，某些国家和种族边缘化社区通常得不到这些资源。

48. 环境公正和气候公正往往与可持续发展权联系在一起。发展权旨在保障社会和经济进步的权利以及通过自决和主权平等实现所有其他人权。大会在《发展权利宣言》中指出，人民自决权包括对其所有自然财富和资源行使不可剥夺的充分主权的权利。发展权“意味着各国人民充分实现自决权利”，其中包括“有权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和谋求他们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⁹⁵

49. 大会在《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⁹⁶ 中明确承认环境保护在防止歧视土著人民方面的重要性。大会在第 29 条中申明，“土著人民有权养护和保护其土地或领土和资源的环境和生产能力。各国应不加歧视地制定和执行援助土著人民进行这种养护和保护的方案。”大会在第 29 条中还将“自由事先知情同意”原则适用

⁹¹ Robert D. Bullard, “Confronting environmental rac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lobal Dialogue*, vol. 4, No. 1 (Winter 2002), p. 35.

⁹² 见 [A/HRC/48/78](#)。

⁹³ 《德班行动纲领》，第 5、8(c)和 111 段。

⁹⁴ 见 [A/77/136](#)。

⁹⁵ 大会第 [41/128](#) 号决议，第 1 条第 2 款。

⁹⁶ 大会第 [61/295](#) 号决议。

于在土著人民的土地或领土上储存或处置危险材料。大会在第 32 条中呼吁各国“提供有效机制，为任何此类活动提供公正和公平的补偿，并应采取适当措施，减少环境、经济、社会、文化或精神方面的不利影响。”

B. 以种族歧视方式剥夺经济和社会权利、自决权和与发展权有关的原则

50. 在许多国家，环境不公正往往是从社会经济不平等的角度来分析的，对种族和族裔不平等的关注却很有限，而且对收集按种族和族裔分列的数据普遍存在抵制。⁹⁷ 尽管贫困、性别、年龄和其他社会特征在使社区遭受环境和气候变化损害方面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但基于种族、肤色、血统和民族及族裔出身的歧视仍然是个人和社区遭受气候和环境损害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系统性种族歧视导致经济边缘化，而且在许多地方，在种族、族裔和民族方面处于边缘地位的群体被困在低收入阶层。处于种族边缘化地位的民众在经济上遭到边缘化，这在限制他们对各自社区发展的控制以及在使他们易于遭受有毒废物和气候灾害的影响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与此相关的是，在种族上处于边缘地位的民众往往对其社区内或社区附近的经济发展缺乏真正的自决权，这使他们经常沦为国家当局或跨国公司设立的种族牺牲区的受害者。

51. 海地民间社会组织联盟在提交的材料中解释说，受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伤害最大的往往是农民、农村妇女和城市贫困社区的居民。⁹⁸ 海地被认为是全球受气候危机影响最严重的五个国家之一，但它只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0.003% 左右。此外，帝国主义列强对海地实行种族化经济和政治统治的历史是众所周知的，并对海地当代的经济状况起到了很不好的作用。⁹⁹ 根据预测，气候变化的影响最终将使海地旱季的长度增加一倍，而洪水和飓风可能会增加。海地人面临着农业生计下降、营养不良和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影响的前景。

52. 美国提交的材料指出，由于经济边缘化、种族隔离、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遗留问题，黑人、拉丁裔和土著群落生活在污染热点附近社区的可能性大得不成比例。他们更有可能面临农药中毒的影响，这是因为经济边缘化使贫穷、因种族被边缘化的人集中从事危险的农业劳动。虽然跨国公司继续其工业活动，但居民往往无法利用地方政府或州政府追究责任。在该国其他地区，各公司继续计划在土著属地和圣地开采和运输化石燃料，并得到渴望从化石燃料中获利的国际金融行为体的充分支持。¹⁰⁰ 在这些情况下，由于经济和政治边缘化，黑人、拉丁裔和土著人民无法行使其发展权和自决权。因此，他们无法保护自己的属地不受经济发展的影响，而经济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使跨国公司和社区外的精英阶层受益。¹⁰¹

⁹⁷ European Network against Racism 提交的材料。

⁹⁸ 全球司法诊所提交的材料。

⁹⁹ 见 [A/74/321](#)。

¹⁰⁰ Saldamando 提交的材料。

¹⁰¹ 土著环境网提交的材料。

53. 有一份材料指出，巴西的贫困非洲裔人由于经济边缘化和被隔离到危险地区，不成比例地遭受洪水和山体滑坡的影响。巴西的政治社会结构使种族化民众的生活条件更加脆弱，而公共政策制定者未能解决不稳定的生活条件，因此，巴西非洲裔人成为这类灾害的不成比例的受害者。¹⁰²

C. 种族歧视性的民事和政治迫害

54. 由于环境种族主义，对致力于保护其社区免受环境损害的人权维护者和环境保护者的迫害成为常规。在世界各地，这些维权者往往来自土著社区或其他种族边缘化群体。如前所述，种族边缘化必然带来经济和政治边缘化，而当边缘化群体在政府和跨国公司的剥削面前努力维护其权利时，这些群体就会受到严重迫害。对于来自种族和族裔边缘化群体的人权维护者而言，只能有限地追究责任。前任人权维护者问题特别报告员在记录环境人权维护者的死亡和暴力行为时解释说，“围绕环境权发生冲突的系统性原因之一是国家、公司和环境人权维护者之间的权力不平衡”。¹⁰³ 这种权力不平衡的结构性基础是系统性种族主义，它将处于种族边缘地位的人完全排除在政治决策之外，并使活动人士和领导人遭受种族化暴力。

55. 据一份材料称，在巴西，土著和巴西非洲裔领导人因倡导反对在其土地附近的工业项目而成为公共和私营行为体的攻击目标。¹⁰⁴ 全球见证组织报告说，巴西是世界上被谋杀的环保人士人数第四多的国家。传统居民、基隆布人、沿河社区和土著社区因其属地上的各种经济活动不断受到压力，并遭到威胁或残酷暗杀。¹⁰⁵ 在环境冲突加剧的帕拉地区，据报发生几起雇凶谋杀环境活动人士的案件。在这些事件中，所有的受害者都是争取通过森林保护实现平衡生活方式的黑人妇女。据另一份提交的材料报告，一名南非环保活动人士(也是一名黑人妇女)在反对煤矿扩张的斗争中被暗杀。¹⁰⁶ 还有一份材料强调了对尼日利亚奥戈尼社区活动分子的谋杀、强奸和酷刑，因为壳牌石油公司在那里摧毁了土著人民的生活和生计。¹⁰⁷

56. 另一份材料报告，在印度，土著和达利特领导人也因倡导反对侵犯其文化自主权的地方环境政策而面临拘留和刑事定罪。¹⁰⁸

D. 剥夺土著人民和非洲人后裔的权利

57. 正如特别报告员关于全球采掘主义的报告所指出的，土著和非洲裔人民经常处于采掘项目的第一线，因此承受着环境退化所造成的巨大损害风险。与此同时，气候变化威胁着太平洋、美洲、加勒比、亚洲和非洲的土著人民，可能使他们失

¹⁰² 巴西黑人争取权利联盟提交的材料。

¹⁰³ 见 [A/71/281](#)。

¹⁰⁴ 巴西黑人争取权利联盟提交的材料。

¹⁰⁵ Monica Nunes, “Família de ambientalistas é assassinada no Pará: pai, mãe e filha tinham projeto de sultura de quelônios no Rio Xingu”, 11 January 2022.

¹⁰⁶ D’sa 和 Bond 提交的材料。

¹⁰⁷ 经济和社会权利中心提交的材料。

¹⁰⁸ Gupta 提交的材料。

去家园。大量采掘项目和随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可归因于有计划地剥夺土著和非洲裔人民的土地，剥夺他们的土地和自决权。

58. 根据一份材料，¹⁰⁹ 在巴西，北萨帕是公认的受保护“基隆布人”属地，自1960年以来一直是基隆布人社区的家园。因公路建设、农业企业的攻击、巴西石油公司铺设天然气管道以及萨马尔科公司经营的 Fundão 大坝破裂，该地区居民遭受着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大规模砍伐森林、溪流干涸、填埋山泉、动物死亡及在水和土壤中大量倾倒农药之苦。在巴西最大的基隆布人属地上建造 Alcântara 发射中心，导致 312 个基隆布人家庭被强行搬迁，更多的家庭继续流落到全国各地。

59. 另一份材料报告了对尼泊尔 Chepang 土著社区实施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包括未经自由事先知情同意而在其领土上进行建设和开发、破坏其家园和生计以及对社区成员的野蛮暴力行为。¹¹⁰ 尽管尼泊尔颁布了旨在保护土著人民的法律，但一份材料强调，缺乏落实这些法律的专用资源。该材料报告了 Sonaha 和 Haliya 社区的情况。这两个社区仍然未被纳入旨在保护土著社区的政府框架。¹¹¹

E. 生态法西斯主义

60. 在世界各地的极右翼和新纳粹圈子里，人们观察到了一种被称为“生态法西斯主义”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¹¹² 生态法西斯主义运动把处于种族边缘地位的群体、少数族裔和少数民族以及被排斥的群体作为环境问题的替罪羊。他们还利用环境问题支持把仇外普及化。生态法西斯主义言论与白人至上分子的恐怖主义存在联系，特别是在定居者-殖民地国家。新西兰和美国发生的克赖斯特彻奇、埃尔帕索和布法罗枪击事件明确针对处于种族边缘地位的民众，与生态法西斯主义言论有关。¹¹³

四. 实现环境公正、气候公正和种族公正

A. 对主流方法的担忧

61. 全球系统的应对措施和势头仍然严重不足，无法制止生态危机的种族歧视和种族不公正的特点和后果。特别报告员感到关切的是，治理环境和气候问题的主流国际办法实际上在种族不平等和不公正问题上走得更远。

缓解种族歧视与过度依赖市场解决办法

62. 一些提交的材料指出，一些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绿色”解决办法实际上加剧或延续了种族边缘化和不平等。在某些情况下，向化石燃料替代品的过渡正在

¹⁰⁹ 巴西黑人争取权利联盟提交的材料。

¹¹⁰ 国际粮食行动网提交的材料。

¹¹¹ 尼泊尔(达利特人)国际粮食行动网提交的材料。

¹¹² European Network against Racism 提交的材料。

¹¹³ Kate Aronoff, “The Buffalo shooter and the rise of ecofascist extremists”, The New Republic, 2022.

造成“绿色牺牲区”，¹¹⁴ 这意味着种族和族裔边缘化群体不成比例地遭受与开采或加工这些替代品相关的侵犯人权行为。¹¹⁵ 对“绿色资本主义”或“绿色增长”的批评文章指出，这些方法所宣扬的能源转型“往往以殖民安排的永久化为前提”。¹¹⁶ 它们寻求通过转型来维持全球北方不可持续的消费水平，而转型需要在全球南方进行巨大的破坏性开采。随着“绿色新政”在全球北方大量增加，其效力取决于其是否能够消除生态危机的根源，消弭化石燃料经济中固有的系统性种族主义。¹¹⁷ 即使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倡议和貌似“绿色”的私营企业也可能掩盖其逐利目的，造成环境状况恶化并导致冲突。¹¹⁸

63. 磋商参与者报告说，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许多与气候有关的举措是在没有种族边缘化群体的投入、审议或领导的情况下制定的，因此这些举措可能会强化国家和国际经济中已经存在的种族歧视模式。过度依赖技术官僚的知识和将地方社区排除在气候变化领导层之外所起到的作用是，注意力没有放在前线社区所要求的、真正解决当前危机所需的系统性变革。¹¹⁹

64. 例如，碳捕获和储存技术越来越多地被说成是这样的工艺流程，它们可以在工业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进入大气层之前收集这些二氧化碳，并将捕获的排放物运输到可以使用或储存的地点。然而，一份材料报告说，碳捕获既不是避免灾难性变暖的必要条件，也并非大规模可行的。¹²⁰ 事实上，该材料警告说，碳捕获分散了对确保无化石燃料的未来方面所需改革的注意力，而改革成果对处于气候和环境危机前线的边缘化社区的健康和权利至关重要。碳捕获可以锁定当前的污染，却不能促进能源转变。据提交的材料报告，许多碳捕获方案是在已经因有毒工业污染浓度过高而不堪重负的地方启动的。这些地方与上文所述的“种族牺牲区”重叠。这一趋势尤其令人关注，由于需要更多能源为捕获设备提供动力以及在该过程中使用了化学品，碳捕获会增加捕获地点的有害空气污染物排放。

65.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建议采用的其他实验性或投机性技术可能对人权构成重大风险。例如，专家们认为，一些原本用于适应气候变化的“地球工程”项目可能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包括终止震荡、降雨中断、水资源枯竭以及对人类和生态复原力的侵蚀。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专委)警告不要过度依赖未经

¹¹⁴ Christos Zografos and Paul Robbins, “Green sacrifice zones, or why a green new deal cannot ignore the cost shifts of just transitions”, *One Earth*, vol. 3, No. 5 (November 2020).

¹¹⁵ Claire Burgess, “Australia’s lithium extractivism is costing the Earth”, Medium, 10 June 2022.

¹¹⁶ Jason Hickel, “The anti-colonial politics of degrowth”,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88, supplement C (June 2021).

¹¹⁷ Sealey Huggins 提交的资料。

¹¹⁸ Guiseppina Siciliano and others,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Chinese dam-building in the global south”, *Current Opinion i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vol. 37 (April 2019); and Shun Deng Fam, “China came, China built, China left? The Sarawakian experience with Chinese dam building”,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vol. 46, No. 3 (December 2017).

¹¹⁹ Gonzalez 提交的材料。

¹²⁰ 国际环境法中心提交的材料。

证实的技术，因为这些技术可能破坏自然系统，对全球南方社区造成不成比例的伤害。¹²¹

66. 其他方案和政策也可能对全球南方的土著人民和种族边缘化民众产生同样的负面影响。例如，一些专家对“减排+”方案提出广泛批评，认为该方案不仅采用了过于乐观的预测，而且使用了土著属地，剥夺了某些社区的自决权。¹²² 一份材料报告说，“减排+”的作用就是为掠夺土著人民的土地提供掩护。¹²³

67. 有一份材料指出，获得现有气候融资仍然是一个重大挑战，特别是在地方一级。该材料还报告说，专家们将国际气候机构的运作称为一种间接殖民化。各种项目往往由国际机构设想和指导，而这些机构倾向于优先考虑全球北方的观点，而不是全球南方的贡献。¹²⁴

植根于现有国际框架的气候和种族不公正

68. 国际环境法有一个复杂的框架，随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的设立和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和行动计划》，联合国会员国启动了一个全球环境协调制度。有多项条约涉及污染和生物多样性问题，但本节侧重于气候变化治理，包括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框架公约》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三大支柱：适应、缓解和“损失和损害”。

69. 在联合国环境和气候谈判中，全球南方国家一贯主张建立一个国际环境框架，承认全球经济和政治体系中的结构性差异。斯德哥尔摩会议的成果受到全球北方经济学家的极大影响，¹²⁵ 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在会上发言时呼吁采取集体办法解决环境问题，同时强调必须认识到权力不平等和历史支配地位。¹²⁶ 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全球南方国家对全球北方跨国公司的工业活动造成的环境退化和人权影响表示关切。一些谈判者一贯主张，必须根据历史和地缘政治结构来考虑环境问题，¹²⁷ 甚至在1992年于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地球问题首脑会议)上，马来西亚总理也强调，出现了全球北方国家固化的气候殖民

¹²¹ 同上。

¹²² Dehm 提交的材料。

¹²³ 土著环境网提交的材料。

¹²⁴ 经济和社会权利中心提交的材料。

¹²⁵ 见 Karin Mickelson, “The Stockholm Conferenc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orth-South divide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nd the Global South*, Shawkat Alam and others, ed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and Philip Memichael, “Contemporary contradictions of the global development project: geopolitics, global ec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climate’”,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0, No. 1 (2009)。

¹²⁶ Malavika Rao, “A TWAIL perspective on loss and damage from climate change: reflections from Indira Gandhi’s speech at Stockholm”, *As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2, No. 1 (January 2022).

¹²⁷ 同上。

主义。¹²⁸ 然而，全球气候框架并没有为气候公正提供真正的前进道路，因为没有种族公正就没有气候公正。

70. 在里约首脑会议上，会议秘书处估计，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 1 000 亿美元的外部援助，以实现首脑会议的行动计划，即《21 世纪议程》。¹²⁹ 尽管北方一些强国在造成气候危机方面起了很不好的作用，但它们拒绝向南方国家提供必要的援助。¹³⁰ 在 2012 年里约首脑会议二十周年之际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上，全球北方国家拒绝了 77 国集团和中国提出的关于增加财政援助以履行其环境承诺的请求。¹³¹

71. 在国际论坛上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阐述往往忽略了一些国家和跨国公司所承担的历史责任。虽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已载入《里约宣言》，并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得到贯彻，但全球北方国家接受这一措辞的依据是能力的差别或优势，而不是表明国家对历史损害负有责任。¹³²

72. 对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造成的损失和损害进行赔偿和补救的问题，被对损害负有最大责任的大国有意排除在相关框架之外。¹³³ 最终将损失和损害纳入《巴黎协定》是因为达成了一项妥协，使富裕国家免于承担责任。¹³⁴ 因此，《巴黎协定》之后损失和损害框架的轨迹继续与面对历史责任和赔偿渐行渐远。¹³⁵

73. 参与气候变化谈判的国家之间存在巨大权力和资源不平衡，因此所达成的妥协有利于政治上强大的国家，包括前殖民国家，但牺牲了全球南方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有一份材料着重指出，现有的气候缓解干预措施仅以英文提供而且技术性很强，因此扩大了传统气候应对方法与科学气候应对方法之间的差距。¹³⁶ 全球北方国家通常能够派出大型谈判团队，并可以依靠资源充足、用英语运作的国家官僚机构，但其他国家却只能派出规模较小的谈判团队，而且

¹²⁸ McMichael, “Contemporary contradictions”.

¹²⁹ Martin Khor, “An assessment of the Rio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47, No. 28 (July 2012).

¹³⁰ John Vogler and Hannes R. Stephan, “The European Union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leadership in the making?”,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Politics, Law and Economics*, vol. 7, No. 4 (December 2007).

¹³¹ Khor, “An assessment of the Rio Summit”. 另见经济和社会权利中心提交的材料。

¹³² Sumudu Atapattu and Carmen G. Gonzalez, “The North–South divide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framing the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nd the Global South*, Alam and others, eds.

¹³³ Dehm 提交的材料。

¹³⁴ Maxine Burkett, “Reading between the red lines: loss and damage and the Paris outcome”, *Climate Law*, vol. 6, Nos. 1–2 (May 2016), p. 124.

¹³⁵ Julia Dehm, “Climate change, ‘slow violence’ and the indefinite deferral of responsibility for ‘loss and damage’”, *Griffith Law Review*, vol. 29, No. 2 (2020).

¹³⁶ Vano 提交的材料。

本国首都提供的支持有限。¹³⁷ 这种不平衡因北方国家庞大的经济能力而加剧，而北方国家的经济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南方国家的种族主义统治而建立起来的，并且这种不平衡使北方国家能够对南方国家施加更大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如果全球北方国家没有履行其气候义务，或没有对历史上的和当前的气候不公正提供赔偿，全球南方国家并没有有效、可靠的手段来向其追究责任。

74. 对于在面临生态危机时是否需要更好地遵守现有国际标准，存在着重要的辩论，但正如所收到的材料中所强调的那样，一个核心问题是现有的国际法律框架。例如，除上述情况外，国际法未能提供有力的规定，追究跨国公司对不成比例地影响在殖民时期被指定为非白人的民众和属地的侵犯人权行为所承担的责任。国际投资法目前对环境负责的采掘监管起着威慑作用，因为国家环境和其他监管可能导致昂贵的仲裁程序，从而降低外国投资的价值。另一个令人关切的问题是，适用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已成为“超技术官僚式筒仓”，既与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法律体系脱节，也与形成生态危机并受其影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脱节。¹³⁸ 甚至在国际环境讨论中，自然和环境的概念也仅限于商业性、以人为中心的对自然的认识，这种认识可以追溯到早期的欧洲学者，并且仍然是国际法的主要框架。¹³⁹ 已经造成生态灾难而且正在决定全球应对措施的世界观仍然立足于欧洲中心主义，并继续排斥其他民族的世界观。这种认识上的帝国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种族公正问题。

B. 建议

75. 本报告传达了实地的严峻情况，但仍有种族和族裔边缘化群体每天都在挑战环境种族主义和气候不公正，并正在更广泛地规划实现气候公正和环境公正的道路。在磋商中，全球备选办法织锦提供了一个例子。¹⁴⁰ 这是一个“网络的网络”，是一个不分等级的横向倡议，侧重于地方、区域和全球各级的团结、战略联盟和系统解决办法。其他例子包括石油变革国际组织和土著环境网、¹⁴¹ 土著保护协会、南部非洲性别平等与妇女促进气候公正组织、属地社区全球联盟和 Mouvman Peyizan Papay。这些只是基层环境和气候公正倡议的几个例子，这些倡议也正在结成跨国联盟，并使处于边缘地位的种族和族裔群体集中参与环境和气候相关知识的生产。单靠地方主义不能解决全球生态危机，而适应、减缓和损失及损害的全球办法必须由处于全球生态危机前线的基层组织和在种族、族裔和民族上处于边缘地位的群体的网络来制定，并且及时响应它们的需求。

¹³⁷ Danielle Falzon, “The ideal delegation: how institutional privilege silences ‘developing’ nations in the UN climate negotiations”, *Social Problems*, spab040 (2021).

¹³⁸ Gonzalez 和经济和社会权利中心提交的材料。

¹³⁹ Ushu Natarajan and Kishan Khoday, “Locating nature: making and unmaking international law”,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7, No. 3 (2014).

¹⁴⁰ 见 <https://kalpavriksh.org/our-work/alternatives/global-tapestry-of-alternatives/>。

¹⁴¹ 土著环境网和石油变革国际组织, “Indigenous resistance against carbon”, 2021 年 8 月。另见 Kaswan 提交的材料。

76. 特别报告员还向会员国以及联合国环境和气候治理制度内的利益攸关方提出以下建议：

77. 采取全球办法，切实回应以下事实：若要实现气候公正，就必须实现种族公正；若要实现种族公正，就必须实现气候公正。若要应对环境退化和气候不公正对种族造成的不同影响，就必须从根本上调整政治机构、经济制度和法律原则的导向，以纳入种族公正和种族平等方面的优先事项。“绿色过渡”也必须是种族公正的过渡。向更清洁的能源形式过渡、气候适应和其他方案必须采取步骤，包括采取特别措施，确保气候变化对策不会延续种族边缘化和种族歧视的模式。真正的种族公正需要结束环境种族主义，还需要适应、减轻和消除损失和损害的框架，以根除全球经济、政治等级制度和法律框架中固有的系统性种族主义。这包括实现法律和经济制度的全盘非殖民化，以确保包括土著人民在内处于种族边缘地位的民众拥有真正的自决权，包括对其领土的主权。正如一份材料所指出的，种族公正和气候公正需要财政公正。¹⁴²

78. 优先考虑对历史上的环境和气候损害以及源于历史性不公正的当代损害作出赔偿。特别报告员敦促会员国和利益攸关方查阅她 2019 年关于对根植于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种族歧视作出赔偿的报告，该报告同样适用于气候和环境公正。赔偿必须解决历史上的气候不公正问题，并消除当代系统性种族主义——这是全球生态危机背景下历史不公正的遗留问题。鉴于当代国际法律原则对追究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构成阻碍，联合国会员国必须使这一法律非殖民化或对其进行改造，使之能够保障全体人民的真正平等和自决。赔偿必须要有建立公平的国际经济、政治和法律框架，是调整全球秩序的方向并使之摆脱生态危机的先决条件。关于赔偿途径的建议越来越多，若要取得进展，就必须在全球、国家和地方各级与因种族、族裔和民族被边缘化群体进行合作和建立伙伴关系。

79. 特别报告员强调，自决权包括土著人民根据自己的条件和时间表并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实现发展的权利。土著人民是多种多样的，有着不同的需求、优先事项和治理结构。不应强迫土著人民充当“自然环境的专职管理人”这种绝对或定型角色，也不应使他们陷入由国家政府推动的家长式发展安排。

80. 制止与气候和环境有关、具有种族歧视性质的侵犯人权行为，并向受影响的个人和群体提供有效补救。特别报告员敦促各国落实多项特别程序任务提出的建议，这些特别程序任务已经提出可在这方面提供帮助的技术建议和其他建议。应该对气候移民和气候难民提供必要的法律和实质性保护，特别是在对气候不公正负有历史责任的国家。若要实现种族上的平等和不歧视，就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土著家园，减轻气候变化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各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还必须确保关于环境和气候影响的数据收集符合人权原则，并按种族、族裔和民族归属分列。

¹⁴² 经济和社会权利中心提交的材料。

81. 有系统地追究跨国公司对环境种族主义和气候不公正的责任。
 82. 因种族、族裔和民族而处于边缘地位的个人和人群(包括妇女、性别多样者、残疾人、难民、移民和无国籍人)在全球和国家气候治理方面的切实参与和决策要制度化。
-